

大覺禪寺

孙荣芬 张蕴芬 宣立品 著

阳台山者

薊壤之名峰

清水院者

幽都之胜概

跨燕然而独颖

侔东林而秀出

辽咸雍四年

《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大覺禪寺

孙荣芬 张蕴芬 宣立品 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觉禅寺 / 孙荣芬, 张蕴芬, 宣立品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6

ISBN 7-200-06403-3

I. 大… II. ①孙… ②张… ③宣… III. 佛教—寺庙—简介—北京市 IV. B94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5575 号

大觉禅寺

DAJUECHANSI

孙荣芬 张蕴芬 宣立品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哈尔滨市庆大印刷厂印刷

*

720×980 16开本 16.25印张 310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200-06403-3

Z·374 定价: 68.00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内 容 提 要

坐落在北京西郊旸台山东麓的大觉寺，是中国北方一座著名的禅宗寺院。该寺创建至今，已逾千载，历辽、金、元、明、清五代的世事沧桑与荣枯兴衰，虽然琳宫梵宇时增时损，山门浮屠时倾时复，但钟磬声声，香火袅袅，法脉相连，千年未断，可谓一直独颖丛林、享誉京师。

本书作者在记述这所寺院兴、衰、升、沉的历史时，与相应的朝代更迭、人事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各朝的宗教政策，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以及具体的人事关系，在政治、宗教的大背景下，探寻大觉寺的兴衰原委和发展轨迹。此书的这种研究视角和初步研究成果，已不仅仅是单纯在考述一座寺庙的历史，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研究宫廷史、帝王史的珍贵史料，可补正史之缺略。因此，《大觉禅寺》一书，也具有“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的方志价值。

特邀编辑 伊葆力

责任编辑 张秋月

封面设计 王 艳 索 鑫

设计制作 哈尔滨翰翔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李文宗

作者简介



孙荣芬 曾任北京古代钱币博物馆馆长、北京市文物局机关服务中心主任。现任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主任、北京市文物局干部培训中心主任、海淀区政协委员。著有《大觉寺》，发表《大葆台汉墓“黄肠题凑”化学保护和分析》、《大觉寺藏契约文书述略》、《大觉寺悬塑修缮概述》、《旸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考述》、《迦陵禅师与雍正皇帝》等论文。



张蕴芬 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古代史专业研究生班。著有《大觉寺》，发表《大觉寺藏契约文书述略》、《大觉寺寺田的来源》、《旸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考述》、《北京大觉寺殿堂内的佛八宝和海岛观音壁塑》、《洪稚存著书墨》等论文。



宣立品 毕业于北京城市学院文物鉴赏与保护专业，后就读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在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发表《大觉寺悬塑修缮概述》、《旸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考述》、《辽代“文僧”志延》、《北京大觉寺的二十诸天造像》、《查声山的卅面套印》等论文。

序 言

《大觉禅寺》作为研究与介绍北京地区佛教寺庙的专著,以历史的时序为经,以大觉寺的兴衰演进为纬,以寺藏文物为载体,从文博工作者的视角,向当代读者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中国的古代建筑、金石碑刻、方志典籍、佛教宗派、园林生态、绘画雕塑、市井民俗、地方风物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作者在叙述这些内容时,充分利用了近年发现的考古资料,在叙述分析的基础上辅以图片。因此,该书可谓信息性、学术性、形象性兼具,能使读者在了解佛教文化的同时,又能得到历史、民俗和审美等多方面的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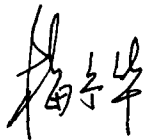
由于大觉寺与历代帝王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所以,本书作者在记述这所寺院兴、衰、升、沉的历史时,与相应的朝代更迭、人事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各朝的宗教政策、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以及具体的人际关系,在政治、宗教的大背景下,探寻大觉寺的兴衰原委和发展轨迹。比如,在清代康熙五十二年到乾隆十二年这三十几年间,大觉寺便经历了从兴到衰,又从衰到兴的三次急剧的跌宕起伏,而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雍正皇帝与时任大觉寺住持迦陵禅师的关系所至。此书的作者详细研读了寺藏经板中雍正与迦陵的著作,了解到深层的原因是:迦陵在康熙晚年曾密参雍亲王帷幄,共议过夺嫡登位大计,因而得宠;后又因知情太多,雍正帝登位后即被放逐而猝死,故而连带得他住持的大觉寺也兴衰转瞬。在某种意义上说,此书的这种研究视角和初步研究成果,已不仅仅是单纯在考述一座寺庙的历史,同时也向读者提供了一些研究宫廷史、帝王史的珍贵史料,可补正史之缺略。因此,《大觉禅寺》一书,也就具有了“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的方志价值。

另外,本书在介绍大觉寺古代建筑时,不一味因循旧说,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文物个体的具体情况,研究对比,慎重作出结论,大胆提出问题。比如,现位于大觉寺院内中路西端的覆钵式白塔,多年来一直被认为建于清雍正六年,是奉安迦陵禅师灵骨的墓塔。而本书作者通过认真查阅相关文献和进行考古调查,发现迦陵墓塔建于他处,而院内这座白塔在寺藏一件清代文札中称“佛塔”,应是埋藏佛教经卷,或佛祖法身(雕像)、法物等的“法身舍利塔”。他们又根据此塔的造型、雕塑与塔旁松柏的树龄,推测其建立的年代可能早于明清。虽然,这只是一种推测,确切的结论尚有待于

科学的考古发掘,然而这种敢于提出问题、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创立于公元前6至5世纪时期的古印度,大约在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中国,即史书中所谓的“东汉之金人兆梦,全吴之舍利飞灵,塔寺于焉竞作”,后来则历晋宋而下,迨隋唐以还,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派衍蔓延,周及华夏,进而使佛教浸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同儒、道合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之一。近两千年来,无论是王朝的更替,还是社会结构的变化,都难以抹去佛教在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中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化了的佛教,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不可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未来。根据文献记载,北京地区的佛教活动,在北魏时期已十分兴盛,当时的幽州城内就建有许多庙宇和佛像;而到了隋唐时期,今天的北京地区则成为中国北方的一处佛教圣地,闻名中外的石刻佛经活动,便始于是时。辽代时,今北京称南京,为辽王朝的陪都。由于契丹贵族佞佛甚于前朝,所以辽南京时期形成了北京佛教活动史上的一个高潮。此后的金、元、明、清四代,佛教活动今昔相延,历朝所尚。北京作为五代帝都,800多年中,京城内外的“城山胜处”,塔寺竞作,列刹交望,梵宇相连。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北京地区的佛教活动历史,有迹可考的已有1500多年了。在今天北京的历史文化遗存里,不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佛教塔寺建筑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在馆藏的个体文物内,佛教文物也是大项。所以,如何有效地保护好这些历尽沧桑、硕果仅存的佛教建筑及相关文物,是我们每一个文博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深入研究本单位负责管理、保护的古代建筑和文物个体,努力把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每一个分支,是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的基础,也是文博界每个部门、单位积极进取的一种表现。《大觉禅寺》一书的3位作者,便是基于这个宗旨,充分利用在大觉寺工作的便利条件,历时4年,集腋成裘,终成一帙。虽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还有待深入,但我们不妨把本书的撰写看作一种尝试和探索。我觉得,恰恰是这种大胆的尝试,表现了当代文博工作者的一种追求,以及他们努力继承、把握中国古代文化的自信态度。



2005年12月

目 录

序言	梅宁华 1
引言	1
一、辽代的清水院	5
(一) 清水院创建和兴盛的背景	6
(二) 清水院参建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幢”	8
(三) 《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	12
(四) 信士捐资刊印大藏经	15
(五) 高僧觉苑	17
二、金代清水院与元代灵泉佛寺	20
(一) “金源别院”——明清文献中的记载	20
(二) 金章宗西山八院	21
(三) 大觉寺的衰落时期:元代灵泉佛寺	27
三、明代的大觉寺	29
(一) 明代帝王崇佛的社会背景	29
(二) 宣德三年重修大觉寺	30

(三) 正统十一年重修大觉寺	32
(四) 成化十四年重修大觉寺	33
(五) 高僧智光	35
(六) 高僧周吉祥	38
(七) 寺存宣德五年大铜钟	41
(八) 明英宗正统十年颁赐大藏经	43
(九) 孝宗敕谕与正德四年庙产碑	44
四、清代的大觉寺	47
(一) 清雍正时期的大觉寺	48
(二) 清乾隆时期的大觉寺	53
(三) 清嘉、道、咸时期的大觉寺	55
(四) 清末的大觉寺	55
(五) 高僧迦陵	58
(六) 佛泉禅师与月天禅师	63
(七) 寺藏清代契约文书中记载的寺院经济情况	66
(八) 《鸿雪因缘图记》中描绘的大觉寺	69
五、民国时期至抗战时期的大觉寺	73
六、新中国建立后的大觉寺	78

七、佛教宗派与法脉传承	82
(一) 大觉寺历史上的佛教宗派	82
(二) 大觉寺的法脉传承	84
(三) 近年发现的明清北京地区“临济宗派偈”	91
(四) 清代北京地区临济宗的法脉源流	94
八、寺院布局和建筑艺术	101
(一) 建筑布局——精巧幽深的汉式寺院	101
(二) 殿堂配置——古朴壮观的殿堂建筑	104
(三) 藏传佛教遗存——覆钵式白塔	108
(四) 寺藏清代文书中记载的寺院建筑名称	113
(五) 风格别致的建筑及装饰	115
九、大觉寺的佛教造像	120
十、碑刻匾额及其他文物	145
(一) 石碑	145
(二) 御制大觉寺诗文	151
(三) 大觉寺内匾额和楹联	153
(四) 其他文物	156
十一、寺藏清代木刻经板	162

(一) 大觉寺寺藏经板概况	162
(二) 清代大藏经——《龙藏》概况	171
(三) 大觉寺寺存佛教书板与《龙藏》的关系	174
十二、寺藏清代契约文书	177
(一) 寺藏契约文书内容简介及分类	177
(二) 寺藏契约文书的研究价值及意义	181
(三) 寺藏部分契约文书	185
十三、寺庙园林及古树名木	203
(一) 寺庙园林	204
(二) 大觉寺内的古树名木	211
(三) 花木时讯	220
附录	222
(一) 历代名人与大觉寺	222
(二) 大觉寺大事记	238
(三) 参考书目及论文	246
后记	248

引言

坐落在北京西郊阳台山东麓的大觉寺,是中国北方一座著名的禅宗寺院。该寺创建至今,已逾千载,历辽、金、元、明、清五代的世事沧桑与荣枯兴衰,虽然琳宫梵宇时增时损,山门浮屠时圯时复,但钟磬声声不绝,香火袅袅如缕,法脉相连,千年未断,可谓一直独颖丛林、享誉京师。

大觉寺始建于辽代,时称清水院。因为文献无征,其具体的创立时间,目前尚难确定,今天我们仅能根据原立于门头沟区斋堂川村双林寺的辽统和十年(992年)石经幢题记及现存于大觉寺内的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的记文,^①推知早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年间,该寺已具备了一

定的规模,并在属地辽玉河县内诸寺中,居“领衔”地位。而到了辽道宗耶律洪基咸雍四年(1068年),该寺院已有“幽都胜概”之誉,并能募得信士捐资计八十万(缗),用来修葺僧舍和印刷大藏经五百七十九帙(计5790卷)龕藏于寺内,可知当时清水院的规模之大、香火之旺,在辽南京(今北京)地区的众多佛寺中,居于前列。

大觉寺在金代的情况,不见载籍,至今也未发现相关的金石文献。但据明末刘侗、于奕正所撰《帝京景物略》一书,记述该寺即“金章宗西山八院,寺,其清水院也”。可知有金一代,不仅仍沿袭了清水院



大觉寺山门

之名,法脉相续,而且被金朝的第六代皇帝完颜璟辟为离宫别苑,列为西山名胜“八大水院”之一,因此使这座帝都远郊的佛教寺院与皇家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可以想见:最迟在章宗明昌年间,由于帝王和后妃们的不时游幸、驻蹕,清水院的殿阁及园林建设,定会极一时之盛,呈现了其发展历史中的第一个繁盛阶段。

金、元易代之际,战乱频仍,蒙元大军数围金中都,畿辅糜乱。当此时,西山八大水院多成劫灰瓦砾,清水院恐亦不能幸免。推测元代初期,清水院作为前朝旧寺兼离宫,因破坏甚巨而一度荒圯凋敝,直到元代中期方渐次修复,然而虽钟磬声声,却已非复旧观。关于元代大觉寺的情况,至今未见同时代任何文献记载,仅从明宣德三年(1428年)《御制大觉寺碑记》中“北京阳台山故有灵泉佛寺”的记述推测,元代和明初的百余年间,该寺曾名灵泉佛寺。

明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朱瞻基奉其母孝昭太后之命,出内帑翻修了凋敝已久的灵泉佛寺,并更其名为大觉寺。除这次大规模的翻修外,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朝皇室对大觉寺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修葺。而后一次修建,乃系由宪宗生母周太后出资,竣工后,则派周太后从弟周吉祥主持寺务。至此,大觉寺这座敕建禅院,便一度兼有了太后家庙的地位了。

明代的中早期,是大觉寺历史上第二个兴盛阶段。由皇家内廷出钱并董工的寺院建筑,基本保留至今,也奠定了今天大觉寺殿堂门庑的格局和规模。

明代末年,世乱年荒,义军蜂起,经济衰败,佛事不兴,大觉寺年久失修,廊宇多圯。^②这种局面,可能一直持续了许多年,直至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以前,尚未有较大的改观。^③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至清中期,为大觉寺历史上的第三个兴旺时期。是年,时在藩邸的皇四子胤禛,不仅出资修缮大觉寺,还力荐临济正宗三十四世嗣法传人迦陵(性音)禅师主大觉寺方丈。迦陵与胤禛交往甚密,他任大觉寺住持后,不仅开堂演法,还辑纂、刊印佛教典籍,一时丛林大振,遐迩闻名。可能因为有雍亲王这个背景,康熙末年,迦陵和尚一度拟将阳台山一带开创成弘扬佛教教义的一座大道场,而把大觉寺改称“佛泉寺”,进而使其成为临济宗的祖庭。^④不过,后来胤禛成为皇帝,因为政治上的微妙原因,迦陵卸寺务离京南行,既而猝死江西,阳台山和大觉寺更名一事,自然作罢了。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至清末近二百年中,除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及道、咸年间,大觉寺或因某种政治压力,^⑤或因国家内忧外患影响,有过几次低谷时期,然而,终清一代,大觉寺作为京郊的一座敕建禅寺和雍、乾两代皇帝的行宫,不仅得到皇家的格外重视和多次修缮,建筑面积与日俱增,而且以其园林的秀丽,环境的幽雅,及当家僧侣们法理修养的精湛,一直都是远近缁素求法拜佛、修心明性的一处伽蓝圣地。

民国和抗战时期,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社会秩序混乱,国民经济衰敝。大觉寺虽然香火冷落,但它作为京西名刹,不仅年年游人不断,而且作为一个特殊的人文

环境,还吸引了达官贵人、民族志士等各种层面的政教人物及文人学者游览或栖止。民国十八年(1929年),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改庵,出资修补寺内所藏《宗鉴法林》一书书板并刊印流传,这是民国期间大觉寺一次较大的弘法活动。1937年,北平沦陷,西山一带寺庙均落敌手,大觉寺则一度被日伪军强占为军事据点。在此期间,千年古刹,遭到了惨重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积极保护文物的基础上,对残破的建筑进行了多次维修,今天已基本恢复了明、清两代寺院建筑的面貌。大觉寺坐西朝东,依山就势,步步递高。全寺有殿堂9处,建筑布局大体上分为中路、北路和南路。院内中轴线长约400米。山门内有一长方形水池,名功德池;过池有钟、鼓二楼南北对峙;再往后,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无量寿佛殿、大悲坛、龙王堂等殿阁依次坐落。其中,天王殿、大雄宝殿、无量寿佛殿,是明代的遗存。龙王堂是全寺最后,也是最高的一座建筑,楼前有高15米的覆钵式白塔一座。寺的北路为旧时僧舍;南路亦称行宫,是由四宜堂院、憩云轩、领要亭及山石、泉瀑组成的园林式建筑,均系清代雍、乾年间所建。大觉寺南约一公里的山坳间,有塔院一处,曾建立有该寺明、清两代僧人灵塔百余座。塔院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曾奉敕重建,四围有院墙、门楣,并设置人员看护。可惜这片颇具规模的古代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被毁,现仅存一片老松古柏,森森而立。

从佛教宗派上分,大觉寺是一座以禅宗临济宗为主的寺院。辽、金、元三代的清水院和灵泉佛寺,由于史料缺乏,虽不能

准确指定其宗派,但通过时代背景和侧面材料分析,也可以对其宗派归属做一些推测。如辽南京析津府地区的寺庙,律院和密院居多,禅院甚少。辽咸雍四年(1068年)《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载,立碑僧人为“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大师赐紫沙门觉苑”。按照常例,当时觉苑应是以虚銜高阶而兼主清水院寺务的。而觉苑是当时著名高僧,他通内外典,是一位密宗大师。据此推断,辽代的清水院,教理上可能属于佛教密宗。

据相关文献记载,金中都时期,佛教崇禅宗,又以临济宗为盛,中都地区寺庙,也多为禅院。金代清水院,佛教寺庙而兼离宫别苑,汉化甚深的金章宗辟其为游幸之地,估计应是一座禅院。元代灵泉佛寺的宗派情况,文献无征。但元代初年,元大都的禅宗教派十分兴盛并发展很快,金中都旧时的一些著名寺院,多为禅宗所占,估计前朝“八大水院”之一的清水院,在灵泉佛寺时期,可能仍是一处禅林。不过,自忽必烈即位开始推崇藏传佛教,对盛极一时的禅宗教派加以限制,更名为灵泉佛寺的清水院是否主禅宗,还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兼行,就不得而知了。明、清两代的大觉寺,一直是北方临济宗弘法的活动中心,史料记叙较详,早无异议。特别是清代,大觉寺先后出了几位学养较深的临济派高僧,对于弘扬禅宗教理、重振宗风,曾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明清两代,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统治者很重视藏传佛教,所以,藏传佛教对于这所敕建禅寺的影响不小,如在今天寺存的文物中,带有密宗色彩的佛教造像,就占有一定的比例。

大觉寺是一座高僧辈出的古刹。见于

载籍的,如辽道宗时期的觉苑,赐号总秘大师,位至公卿,有名冠京师之誉。再如,明宣德年间曾主大觉寺方丈的智光和尚,更是明初的著名高僧。他一生政教成就卓著,生前被封为大国师,圆寂后朝廷赐授“大通法王”封号。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开始兼大觉寺住持的周吉祥,是明朝僧录司的最高官员——左善世钦命掌印。他在大觉寺主寺务达15年之久,死后建灵塔两处分葬。清迦陵(性音)禅师,为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代嗣法传人。他深通佛学,独悟禅机,示寂后敕封“国师”之号,平生著述甚丰,有多种佛学著作传世。清乾隆九年(1744年)圆寂的佛泉(实安)禅师,也是一位精通佛理的高僧。他是迦陵的大弟子,临济正宗第三十五代传人,曾继其师主大觉寺方丈,著有《语录》数卷传世。

历经一千多个寒暑交替和五个封建王朝的政权更迭,大觉寺在多变的沧桑世事中虽几兴几衰,却衣钵相传。既完整地保存了一处古代建筑群落,也保留了造像、碑刻、经板等许多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从现存殿堂建筑看,大觉寺是一处典型的汉传佛教寺院,其建筑设计、殿堂配置和园林布局,是中华民族光辉文化的凝结,具有比较高的研究价值与美学价值。此外,大觉寺还藏有各类文物千余件,应该重点提到的是经板和契约文书两种。

大觉寺所藏经板计519块,均雕镂于清前期,最早的雕于康熙末年,最晚的刊于乾隆初期。书板的内容为佛教著作,共9种,多为迦陵禅师编撰,有《宗鉴法林》等内典,也有《杂毒海》等外集。其中少部分收入清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编印的

《龙藏》,多数因微妙的政治原因,如《宗鉴语要》、《宗鉴指要》、《集云百问》等,被雍正帝敕令撤出。而幸存至今的这些未正式印刷行世的著作,对于研究清代佛教史和清初宫廷史,都有珍贵的资料价值。

大觉寺另有寺藏契约文书百余件,其时间上起清康熙初年,下至民国初年。这些契约文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土地制度、宗法制度、赋役制度、风俗人情等多方面。不仅直接反映了大觉寺二百多年来寺院经济的各个方面,也间接反映了北京地区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研究寺院经济、社会风俗、土地制度等多方面的价值。

注释:

- ①统和十年经幢记文,陈述辑校,见《全辽文》,第36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阳台山清水院藏经碑记文,见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册,第1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 ②据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黑龙潭》条:“清水者,今绕圯闾出……”可知当时大觉寺院内有倾圯失修之殿阁。该书撰于明代崇祯年间,以上描述系作者亲见,时正当明末。
- ③在大觉寺现藏的一批契约文书中,其中康熙四十五年前的5件,均为该寺典当房产和卖出土地的契约,于此可见大觉寺当时经济危困、香火冷落的窘况。
- ④今大觉寺所藏迦陵编著的《是名正句》、《杂毒海》等书序言中,落款即属“京西大觉山佛泉寺性音”。
- ⑤清雍正末年,雍正帝对已死迦陵禅师态度大变,多次贬斥迦陵的学问人品,并严谕其子弟门徒不得妄言乱行。

一、辽代的清水院

大觉寺创建的具体时间，不见于史籍，已难详考，但现存该寺辽咸雍四年（1068年）“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的记文和题名，作为距今九百多年前的金石文献，对于大觉寺早期的历史，有约略的记述。其碑阳所刊僧志延《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一文，内叙：

阳台山者，蓟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跨燕然而独颖，侔东林而秀出。那罗窟遂，樞性珠以无类；兜率泉清，濯惑尘而不染。山之名，传诸前古；院之兴，止于近代。

以上引文，从侧面记载了当时的大觉寺名为清水院，其兴建（或兴盛）的时间，去咸雍四年已不下百年，并且是当地遐迩闻名的一处胜景——“院之兴，止于近代”与“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即此之谓也。据此可以推测，清水院的创立时间，可能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初年，距今至少有千年的历史了。另外，今北京门头沟区斋堂川双林寺旧址原立有一座经幢，该幢习称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刊立于辽统和十年（992年）。此幢由当时的玉河县令齐讽等当地官员倡建，参建的有本县县域内四座佛教寺院僧侣和邑众千人，而寺院僧侣列前题名者，就有“清水院

山门僧功德主绍迁、院主绍金、绍兴、绍文”及门人等17人。^①此外在《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一文的末尾，有“玉河县南安窠村邓从贵……”的记载，可知，清水院的地域隶属为辽南京道析津府玉河县，又其坐落的山峰之名称，辽代前后一直写作“阳台山”，而“阳台山”的“阳”字写法，则始见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的《御制大觉寺碑》一文中。^②



寺存辽咸雍四年刊立的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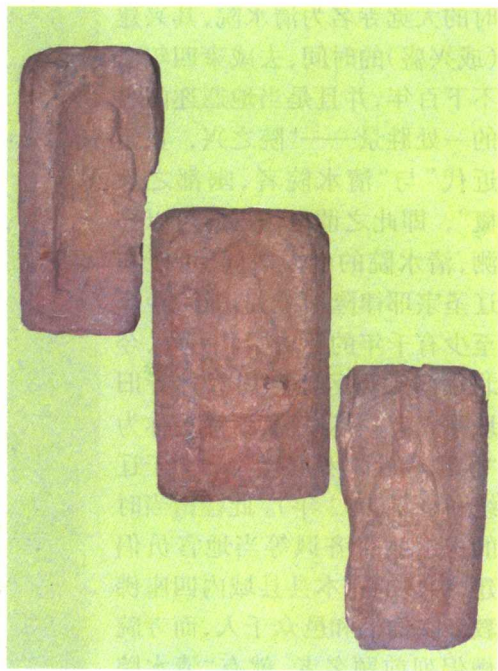
寺存辽代石狮

(一)清水院创建和兴盛的背景

同辽南京地区(今北京)其他一些著名寺院一样,清水院的创建与兴盛,是有深远的历史基础、社会原因及广泛的区域背景的。从大背景说,契丹统治者崇奉佛教,终有辽一代二百余年,其笃信的程度,可与唐代相比而远超北宋,以至于后人“有辽亡于佞佛”的说法。辽代尚佛,其来有自。因为自汉明帝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其传播蔓延的速度很快,至隋、唐时期,已遍及华夏。然而,佛教的过度泛滥,不仅使老百姓深受其害,也与世俗地主阶级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甚至使最高统治集团也感觉受到威胁。因此,自唐以来,曾先后发生了两次灭佛运动:前一次是唐会昌五年(845年),后一次是后周显德三年

(956年),均由朝廷下诏,检括天下僧尼寺院,计废天下寺院7万余所,敕令还俗僧尼数十万人。而当时,契丹已兴起于北方,并开始崇尚佛教,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论,中原王朝的两次灭佛运动,自然造成了佛教的西灭东来、南抑北行局面,这在客观上为幽燕地区,特别是汉文化基础深厚的辽南京(今北京)佛教的兴盛与发展创造了条件。^③

另外,辽南京地区佛教活动的特殊兴盛局面的形成,同辽朝内部的政治、军事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因为辽建立之初,还是一个军事奴隶制政权,其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和杀戮。以燕京为中心的幽燕地区人民,饱经战乱之苦,因此怨恨之情、反抗之心非常强烈。这使迅速封建化



寺存辽代石经幢残件——佛教造像部分